

中国近代哲学史論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 编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 编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06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00

统一书号： 2072·112

定 价： 1.95 元

目 录

- 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代序）……… 辛冠洁（1）
浅谈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王玉如（14）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 张 琢（23）
论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形成…………… 丁宝兰（38）
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规律及其
表现形态…………… 吴熙钊（63）
再论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进化论
——兼论中国近代的唯物论…………… 曾乐山（81）
中国近代进化思想发展初探…………… 邝柏林（99）
进化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 肖万源（128）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研究…………… 雷镇闾（156）
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何成轩（171）
论龚自珍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尹协理（198）
略论龚自珍的唯心主义思想…………… 姜国柱（215）
魏源哲学思想剖析…………… 陈少明（229）
试析戊戌时期严复哲学的特点…………… 刘蕴梅（250）
论康有为的“元”及其实质…………… 吕彦博（266）
抨击奴性 倡导自尊
——评梁启超对半殖民地半封建道德的批判…………… 石毓彬（278）
谭嗣同对儒学和孔子的贬黜倾向…………… 刘振怀（296）

孙中山哲学思想评议	张季平(311)
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哲学	
——论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	袁弘毅(326)
李大钊早期的进化历史观	张连良(339)
论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宋德宣(348)
试论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中的哲学思想	钟兴锦(359)
鲁迅伦理思想初探	戢伟光(373)
“五四”前后胡适派“科学方法”的再评价	陈卫平(386)
恽代英哲学思想研究	吕希晨(416)
编后记	(433)

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代序)

辛冠洁

在我国，长期间以来，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较之先秦、汉—唐、宋—明各断代的研究远为薄弱，但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近三年来，有了很大进展，这表现在：

一、原著整理、集校、注释，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已经或陆续出版、再版的有《孙中山全集》、《谭嗣同全集》、《朱执信集》、《唐才常集》、《章太炎政论选集》、《章氏遗书》、《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注》（清代之部，此书原名《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吉林大学，已出版三辑）、《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辽宁大学，预计出版六十册，已出九册）、《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葛懋春等编，二册）、《中国现代思想史选编》（蔡尚思主编）等等。

二、有关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专著不断出版问世。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1978年）、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80年）、邝柏林的《康有为的哲学思想》（1980年）、肖万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张琢的《鲁迅哲学思想研究》、齐一的《鲁迅思想探索》（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两卷

已付排）。

三、论文明显增多，各种综合性、专业性杂志和论文集中，有关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文章，均占相当比重。

四、学术性会议年年举行。1980年由《中国哲学家评传》编委会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行了中国近代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就中国近代有无哲学及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1981年《哲学研究》编辑部与中山大学在广州联合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就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主线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1982年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已举行过三次：四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七月，由《哲学研究》编辑部与吉林大学哲学系联合召开，八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倡议举办。这三次会议主要是围绕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特点、形态等问题展开讨论，争论均很热烈。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大体可以用“方兴未艾”一语来作形容。

综观全国情况，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学术价值较大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一、中国近代有无哲学（或有无象样的哲学）？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争论的焦点是“有”呢还是“无”？后来逐渐变为“象样”呢还是“不象样”？再后变成是“丰富”呢还是“贫乏”？意见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种，一种意见以为有，象样，丰富，一种意见以为没有，或不象样，不丰富。

持前一种观点的，其论据大体有二：1.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时代，短短一百多年，包含着

三次社会制度的大更动：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它打开了封建中国长期紧闭的大门，几千年的封建古国，从此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多年的大清帝国，从而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第三次是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任何理论的基础则是世界观，也就是哲学。由此看来，中国近代不仅应该有哲学，而且应该有很象样、很丰富的哲学。2.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近代有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那样的力主“变易”的人物；有洪秀全、洪仁玕等力主平均主义、企图建立农业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力主进化的人物；有孙中山、章太炎等力主躐等即突变的人物；更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从主张进化论，进而力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人物。他们又都有阐发其哲学思想的著作。不仅如此，中国的近代，各种思潮彼此争鸣，互相激越，如经世致用思潮、托古改制思潮、进化论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等等都曾留下了自己的影响。因此，中国近代哲学，已经不是可能有、可能丰富的推论，而是不仅有并且水平很高、内容十分丰富的实际问题。

持后一种观点的，其根据大致有：1. 中国近代风云变幻激剧异常，为了应付时局，有思想的人都投身于政治之中，故而只有政治家而无哲学家。2. 抽象思维产生于沉静的思索，而中国近代犹如沸腾的热锅，不容许人们坐下来思索与研讨问题。3. 时代的变革必然引起哲学的变革，固有的已不适时宜，从西方搬来的却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三种原因使得中国近代不

可能有哲学，至少不可能有高水平的、丰富的哲学。

这个争论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一切问题的前提。经过几年的讨论，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已经不是有无，而是高低、贫富的问题了。

二、中国近代哲学分期应该如何断限？

这个问题也有它的发展史。主张中国近代有丰富哲学的人，多年来沿用这样一种分期法，即所谓中国近代哲学史，是指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一段。从其历史内容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或专著，大体都是按此分期的，即使“文化大革命”后编撰的《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等基本上也是如此。但是后来史学界逐渐趋向于把中国近代历史的下限，下移至1949年，即全国解放。胡绳同志新近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明确肯定了这种断限的合理性。中国哲学史界，近来倾向于接受史学界的这种倡议，四月的北京会议，七月的吉林会议已经有了酝酿，及至八月的密云会议，同意这样划分的学者已经可以说是大多数了。自1840年到1949的一百零九年，从社会的发展来说，包括了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过程。从哲学上说，这段时间包含着两个扬弃，即朴素变易哲学（以龚、魏、冯为代表）的被进化唯物论所扬弃，和这种进化唯物论的被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扬弃。因此这种断限，是比较合理的。但是，部分学者对此仍然持有异议，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断限才是最合理的。理由是，从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容上看，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近代哲学，特别是形成与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属于辩证唯心主

义类型；五四运动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传入了中国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此资产阶级哲学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并非同一类型。五四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不能把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哲学划归近代哲学史之内。这虽然是少数人的意见，但言之有理，必将会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细细观察，是有其阶段性的，然而究竟有多少阶段，看法各有不同。一种看法，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作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阶段。这一阶段的哲学特点是“变易”说，著名的观点和命题是“造化无一息不变”，“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代表人物为龚自珍、魏源。第二个阶段可以叫做发展期。其哲学特点是渐变进化论和突变进化论；前者的代表性命题是“器可变，道不可变”。后者的代表性命题是“人事胜天”，变可“蹴等”（即飞跃）；其代表人物前者为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后者为孙中山。第三阶段是没落阶段，其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代表人物当推胡适等人。作为这个阶段之尾声的，主要是熊十力的“新唯识”，金岳霖的“新心学”，冯友兰的“新理学”。与资产阶级的哲学的没落共生的，是激进进化论、进化唯物论的被扬弃，从进化论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发展。

除上述外，也还有其他的阶段划分的意见。一种主张是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其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是以进化论为标志的资产阶级哲学，其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是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种主张是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龚、魏、二洪，龚魏的变易思想和洪秀全、洪仁玕的平均主义思想，构成了进化论的雏型，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开端。第二个阶段，随着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救亡图存的意识深入人心，于是主张变法维新，吸收西学，出现了完整的进化论，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已经突破了传统古典哲学的形态，带上了明显的近代色彩，是中国近代哲学出现新机的阶段。第三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对奴化思想特别是数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批判，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扫清道路的阶段。第四个阶段，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作好了组织、思想准备，这是逐步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阶段。

中国近代哲学史分期断限与其中的阶段性的具体划分是相互交织的，然后后者受前者制约。断限下移，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具有一定影响的问题，它可能使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发生一定变化。

三、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有什么样的时代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而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也就有什么样的哲学。中国的近代是一个风雷激荡、天翻地覆的时代。绵延数千年之久、变化异常缓慢的封建古国，一进入中国的近代，在短短一百零九年内却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阶段，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尚未走完的路程。这种急剧变化

的原因是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和民族危机的极端深重以及两者的交相煽炽。一般说，近代的前期和中期，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民族危机。那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甚至灭亡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当时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主要是振兴民族，救亡图存和谋求自强之道。既然救亡图存迫在眉睫，自强之道也就刻不容缓。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四个基本特点：一是它与政治运动联系得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紧密；二是因为政治斗争剧烈多变，作为政治斗争理论基础的哲学也就充满了活力，而且丰富多采；三是紧张繁重的政治斗争，不容许人们关进书斋沉思静索，以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写作皇皇巨著；四是因为既要从古今中外四处搜求思想武器，就难免带有杂揉、拼凑的痕迹。前两点是它的长处，后两点则不能不说这是它的短处。这短处，只是到了后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认识事物、观察社会历史的武器，才连同它的优点一起被扬弃的。

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比如从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内容方面去探讨它的特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现这样几种情况：1. 为了救亡图存、匡救时弊，很多思想家从龚、魏、二洪，到康、梁、谭、严，甚至到陈独秀、李大钊都主张“变”，从而一方面属意于今文经，欲使“六经为我注脚”，一方面普遍接受西方的进化论，并加以改造，用于改良或革命，正如有的学者主张的那样，在孙中山那里还铸造出了进化唯物论。2. 受着时代使命的驱使，必须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的作用，或者说“心力”，于是许多近代哲学家醉心于王阳明哲学，有的倾心于禅宗和唯识学说，这曾使得陆王心学一时抬头，释家出现回光返照。3. 时代的变革陶冶了很多哲学家的唯物论自然

观倾向，从而使他们十分重视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有的则同时注意中国固有的气一元论。4. 社会的苦难，并没有明显地把人们推到“彼岸”去寻求安慰，倒是培植了三种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就是，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主张均产的太平天国农业空想社会主义；二是没有斗争的、“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书》的空想社会主义；三是不改变政权的剥削阶级性质，而去解决土地问题、资本问题的孙中山的“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这是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实践内容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带有一定唯物主义因素的社会历史观。

四、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形态。

这在目前是一个充满争论的问题。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早期即以龚、魏为代表的以“变易”为特征的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的时期，这不是争论的对象。发生争论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即以变法维新为特征的这一时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形态是机械唯物主义，不论是从本体论上还是认识论上说，它都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但是它却不承认质变，而只承认量变；一种意见认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形态是辩证唯心主义，它的奠基人是康有为、严复、谭嗣同。这种哲学的方法是辩证的发展的，而世界观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以康有为为例，他提倡三世说，认为从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又从升平世进到太平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且越变越好。他正是以这种辩证发展观指导他的变法维新运动的。然而他却同时提出“不忍人之心”，也即“仁”为他的最高哲学范畴。他以进化发展和“不忍人之心”这两条线索构成一整套新

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结束了中国的古典哲学，创造出资产阶级的新的哲学体系。再一种意见认为上述时期的哲学形态应该是进化唯物主义。如果说在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机械唯物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神学和经院哲学的锐利武器的话，那末，进化唯物论便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争取自身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础。进化唯物论的实质内容是“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就是说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物质进化过程。从太极（以太）到人类出现、社会演变，都是通过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本身运动发生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发展完成的。机械唯物论的内在缺陷，一是用纯力学观点解释世界，从而把一切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二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观察事物，不把事物看作为不断发展的自身运动过程，而看成只是数量的增减、场合的移动、外力的推动；三是把认识看成是直观的反映，忽略认识的能动性。这一系列不科学的观点，在中国进化唯物论这里，大体都被克服了。因此中国近代的进化唯物论高出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机械唯物主义。但是它却没有突破资产阶级的宇宙观，它与机械唯物主义一样，其社会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毕竟不承认人的社会性、阶级性，而总是离开历史发展——阶级斗争的发展去观察世界。进化唯物论观点的提出，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件具有意义的事情。首先，它可能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哲学史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或者说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哲学史得到一个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带着时代烙印的，也就是说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形式，并且终究会由人们以一定概念反映出来。比如先秦论天，人们称之为天道观，两汉论天人

关系，人们称之为天人之际，魏晋论本体（有无）人们称之为玄学，隋唐崇佛，人们称之为禅学，宋明重理气，人们称之为理学或道学，明清之际重实际，人们称之为经世致用，到了近代，一直没有把它的哲学思潮用概括的语言提炼出来，现在人们则可以说近代哲学谈的是进化，我们把它称之为进化唯物论了。其次，它提出了又一种哲学形态，恩格斯把欧洲唯物论归结为朴素的、机械的、辩证的这样三种形态，现在中国又抽象出一种进化的形态。这种形态是特有的，但它毕竟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页。总之进化唯物论的提出，可能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发生相当影响。目前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有的学者对这种观点持审慎态度，但问题的性质决定了人们都不能对它取冷漠的态度。

五、中国近代哲学的学术渊源问题。

中国近代哲学的学术渊源，如果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下限只到五四运动，那末，大致说来是两个，一是中国固有的古典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一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尤其是星云说、进化论；此外，还有欧洲的近代哲学。如果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下限移至1949年全国解放，就还要加一个，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上述渊源观，大体说是没有争论的，而在西方进化论与中国古典哲学各自给了中国近代哲学以什么样的影响，各自的地位如何等问题上，看法却很不一样。总的说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哲学渊源的主流是“中”而不是“外”，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取得胜利之前，中国近代哲学的中心线索是“变”，它显然主要来自《易传》的变易与《公羊传》的三世说，西方的进化论只不过是被用来补充这种传统观点的，与此

相反的一种观点，是中国近代哲学主要来自“外”，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进化论、机械论、天赋人权说，只不过把它们纳入了中国哲学的规范。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可以称之为“新学”，它是中外哲学思想和中国古今哲学思想对立统一的产物。它是一种新学说。这种新学说从外国拿来了进化论并按照他们自己的精神面貌进行改造，成为一种中国型的进化论；它从《易传》那里拿来了变易说，从《公羊传》那里拿来了三世说，从古典唯物主义那里拿来了气一元论，从传统儒家学说中拿来了“仁”（甚至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哲学范畴），同样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纳入了中国型进化论的总轨道。意见的出入和争论还会存在下去，然而学术渊源上的这样一种嬗变，则是大体肯定的，即：资产阶级以其进化论终结了固有的、传统的中国古典哲学，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扬弃；无产阶级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结束了资产阶级的为期不长，但也曾经是富有生气的哲学，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扬弃。

六、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问题。

文章的开头，我们用“方兴未艾”来形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形势。这里我们还从此说起。

如果我们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先秦、汉一唐、宋一明、近现代这样四大断代去分别观察，那末，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以先秦研究最为兴盛，其次是汉一唐，再次是宋一明，最后才是近现代，就是说过去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按照历史的顺序逐段递减的。这种情形并不奇怪，而有其历史的原因：第一，先秦是中国哲学史的总源头，不探源就无法疏流；第二，汉一唐是又一个源头，经学、黄老、玄学、佛学等等，都由此

发生，研究经学离不开两汉，研究玄学离不开魏晋，研究佛学离不开隋唐；第三，理学被左倾思潮涂抹得很黑，以致在过去人们不敢问津，近现代被视为杂、乱、贫乏，过去人们不屑于一顾。但现在不同了，情况已经并且还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汉一唐哲学研究趋势于沉寂，先秦哲学研究有下降迹象，而宋一明哲学研究奋然崛起，超越了先秦、汉一唐的研究，近现代哲学研究更是一峰突起，大有盖过宋一明哲学研究之势。这也很自然，因为左倾思潮设置的禁条已经被打破，近代有无哲学的问题也已大体辨明，自然就为宋一明、近现代哲学研究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中国现代哲学研究越是兴盛，遇到的难题就会越大，分期问题、特点问题、历史地位问题等等老帐，正在解决，事情好办。接踵而至的将是这样几个难度更大的问题。

第一，中国近代哲学史断限的下限下移至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过去认为的现代成了近代、当代成了现代。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人物的研究，胡适之外，对从熊十力一直到冯友兰一系列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研究都要逐个提到议程上来。这无疑是一大困难。这里有从事研究的队伍的问题，也有资料的问题，还有一个惰性问题，这就是说，人们的习惯总以为越是近的越难“论定”。另外，是必须解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怎样扬弃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难度是很大的。然而发展的趋势已经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就必然会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要对过去的争论作出合理的答复。对过去的研究成果做出合理的概括，今后必然会增加一些宏观的、纵的研究，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历史发展和逻辑关系统一起来，把史与论